

張之洞

黎仁凱

钟康模

著

与近代中国

河北大学出版社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

黎仁凯 钟康模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建民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 /黎仁凯,钟康模著. - 保定:河北
大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81028-561-0

I . 张 … II . ①黎 … ②钟 … III . ①张之洞-生平事迹-
研究 ②洋务运动-研究 IV .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630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1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50mm×1168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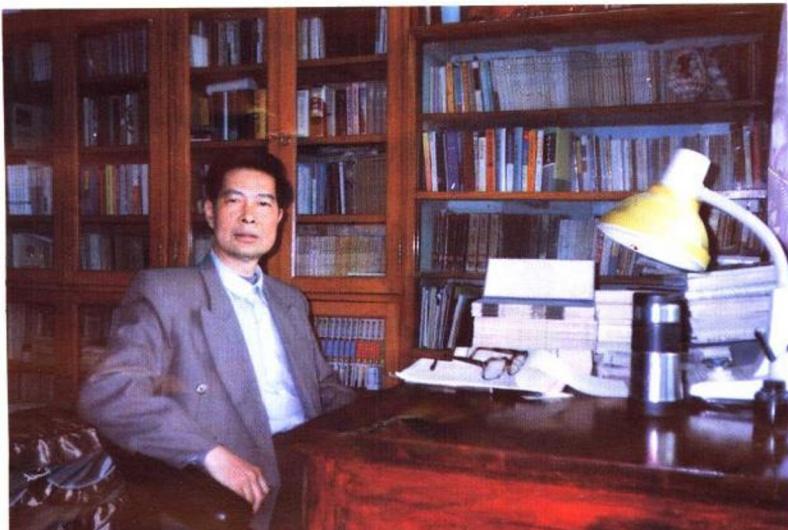
印张:9.2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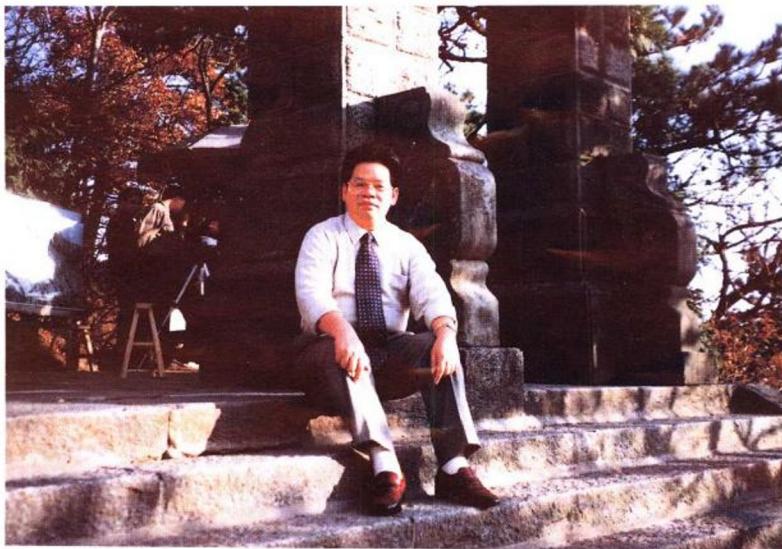
版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8 月第 1 次

定价:15.00 元



黎仁凯 1940年生，广东丰顺县人。现任河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著作多部，其中《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先后获得河北省第四届和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和北方十五省(市)社科优秀图书奖，并撰有《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主编)等著作。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多篇获得省级奖。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1995年)，主持承担了有关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赴美国加州多所大学讲学，现主要从事晚清史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钟康模 1949年生，广东蕉岭县人。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旋又在该校攻读中外关系专业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后分到广东省委党校工作，教学科研均有建树。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副校长，南方经贸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广东省劳动模范。自1987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教材20余部，在全国各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有些论著被评为全国、全省的优秀著作和优秀论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现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和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

序 言

张之洞的道路

张之洞从 1837 年(道光十七年)降生到 1909 年(宣统元年)辞世,一生跨越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他逝世后两年,清朝也便寿终正寝了。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的衰败之世,是外国资本主义凭借其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将其卷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社会因素诞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尖锐的时代,张之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走完了 73 载的人生旅程。

张之洞出身于官僚世家,是儒家思想陶育出来的封建士子。他在科举仕途上可谓少年得志,1853 年 16 岁应顺天乡试中举,1863 年 26 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官场。经历数年闲散京官后,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和四川学政等职。十载学官生涯,为他兴学育才、结交朋僚、招贤纳士、考察社会提供了良好机遇,也为后来仕途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876 年他回任京官,先后充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左春坊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学士,再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多年京官使他对朝政的得失、朝廷的内幕、官场的明争暗斗有较多的了解。此间,他投入了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的怀抱,以“遇事敢为大言”而著称,频上奏章,纠弹时政得失,成为当时著名的“翰林四谏”或“清流六君子”之一,以其学术文

章和敢言直谏而初露锋芒。

1881年底，张之洞被授为山西巡抚，从一名闲散京官一变而为手握实权、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这是他仕途的一大转折。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大刀阔斧整顿吏治、锐意改革，先后采取了禁种罂粟、兴学育才、七厅改制、设洋务局招聘洋务人才、设立实业机构、筹办山西练军等措施，使山西的面貌有所改观。他还通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接触与交往，欣赏和接纳了其提出的西化方案。他也十分向往洋务派炙手可热的权势，这表明他已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与此同时，张之洞仍保持着清流丰采，对国家政治、外交大事倍加关注。其时法国正侵略越南，他十分关注西南边疆局势的发展，频频上奏备陈方策，得到了朝廷的重视。1884年清廷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即实授）。从此，张之洞由较偏远闭塞的北方内地来到了对外通商的南海前哨，且参与主持中法战争及对外交涉，这为其仕途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机遇。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频频对外接触，使其眼界大开。中法战争结束后，他以洋务为急务，倾心经营洋务事业，设立办理洋务处，试造浅水兵轮，创办制钱局，设枪弹厂、办水陆师学堂、架电线、修码头、筹建广州织布局、枪炮厂及议修芦汉铁路等。这些表明，他不仅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而且大踏步地向洋务大吏进军了。

1889年，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并督办芦汉铁路南段。统辖地盘的改变并没有动摇他大办洋务之决心，相反，他把湖北作为大展实业鸿图的基地，将在广州筹设的各厂设备迁往湖北，兴办了一系列的实业；而且雄心勃勃，“欲在南方造一局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建树功业相颉颃”。短短几年间，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轻重工业在江汉平原上拔地而起，两湖书院等教育事业蜚声海内，到甲午战争前，他终于成了能与李鸿章相匹敌的洋务首领。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山海关前哨筹防督战。清廷命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他到江宁后，积极筹备战守，为前线筹饷、运兵、备械，又编练自强军。他的抗战言行受到了国人的赞许和敬重，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国内群情激愤。他上疏痛斥李鸿章对外妥协投降，力阻割让台湾，鼓励唐景崧、刘永福顾全大局、和衷共济，坚持抗日斗争，一时赢得了“天下之望”。

维新运动兴起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张之洞捐款5千两列名参加。不久又与康有为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继而资助出版并大力宣传《时务报》，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此时是张之洞一生中社会声望较高的时期。但由于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在学术观点、思想体系和治学态度等方面歧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关系逐渐疏淡，学术上的分歧论争也越来越明显，并逐渐向政治斗争演化。同时，凭借他久历官场的经验和政治敏感，已预感到维新运动前途不妙。他便撰写《劝学篇》，一面鼓吹忠君卫道，一面宣传自己有别于康梁的变法纲领，系统地阐释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成为“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喋血京门后，一些支持变法的官吏遭贬斥和打击，张之洞虽因事先撰写《劝学篇》而获免，但仍心有余悸。他竭力依附慈禧太后的皇权，诋毁维新派，以洗刷他昔日与维新派之间的瓜葛。自此，他政治上一度沉寂，行事也更为谨慎了。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大地蓬勃兴起，坐镇武昌的张之洞虽未受到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冲击，却十分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一开始就站在义和团的对立面上，将义和团同历代农民反封建斗争等量齐观，认为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因而积极替清廷出谋划策，提出了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主张。在此期间，

他努力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扩展，镇压了长江流域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起事；又与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同外国帝国主义协议了“东南互保”。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清政府与列强议和，张之洞又参与了辛丑和议，在政坛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1年清廷推行变法新政后，张之洞奉命“遥为参预”。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再次联衔，连续向清廷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心议题是兴学育才，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该奏折多为清廷所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蓝本。他也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新政的主角之一。在接踵而来的预备立宪过程中，他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他是主张及早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较早奏请推行立宪的督抚大员之一。但随后他对官制改革、司法独立等问题又提出了一些异议，主张不必“更张太多”。总的来看，辛丑以后的张之洞声誉日隆，在文化教育方面建树尤多。他与张百熙等议订了“癸卯学制”；与袁世凯等联衔奏请废除科举制；大力开办师范学堂，还派留学生出国等，均卓有成效。1907年，年逾古稀的张之洞奉命入京，充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旋又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在清朝风雨飘摇之际，他仍致力于调和满汉矛盾，力图挽大厦之将倾，直至1909年10月病逝，为清廷竭尽了愚忠。

张之洞由科举入仕之时，也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日。晚清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均以兵戎发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而成为拥有实力的洋务大吏。张之洞则不同。他靠摇笔杆子起家，以“清流”得宠而名噪朝野，又不失时机地向洋务派转化，大办企业，充当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又倾心兴学育才，成效卓著，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他不仅以后期洋务首领而著称，同时又是维新派的同路人、东南互保的盟主、清末新政的主角等。对外态度上，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心，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调和中外矛盾和利用均势是其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

张之洞仕途青云直上、有惊无险的独特道路，铸就了其独特的政治性格。他既“善趋风势”又颇具“书生习气”；他倾心办企业，却无意积聚私人资本去当资本家，而总以封建清官自律；他崇尚西方科学技术、钦羡西方政治制度，而又恪守封建名教纲常和保存国粹；他保持“清流”遗风又相对讲求实际，等等。在他身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质杂糅并存，他是一个具有矛盾二重性的两栖人物。

诚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张之洞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复杂的过渡型人物。应该说，这种过渡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缩影。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主义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化、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张之洞也是一个由封建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未到达彼岸的人物。他一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其性格特征是政治上趋新、经济上敏感、军事上开明和文化上恋旧。趋新、敏感和开明驱使他去追逐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出现了多方位的“过渡”；但文化上的恋旧又注定了他最终未能转化成为资产阶级。他的思想总是陷在趋新与恋旧、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态贯穿其一生。他始终在寻觅一条折衷新旧、调和中西之路。

张之洞从科举及第到去世，走过了 47 年的仕宦生涯。他的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学术等领域。他集封建官僚、近代企业巨头、军事家、教育家与学者于一身，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兴革，都留下了张之洞的足迹和身影。时人曾言，张之洞“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① 此话就其事业和学术而言，似颇确当，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大影响。但就政治而言，他又深深陷入了趋时和附权的矛盾之中，常常为此两难抉择而绞

^① 《张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第六辑，巴蜀书社 1988 年版，第 111 页。

尽脑汁。因此，深入研究张之洞走过的路，将大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史研究的深化。本书之所以取名《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一是鉴于学界已出版了多种张之洞的传记或评传，从不同角度对张之洞的生平传略作过诸多叙述，过多的生平铺叙易于雷同，也没有必要。二是我们的初衷是选择张之洞在近代中国重大事件及兴革中的表现加以论述，透析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借此抒发我们多年来对张之洞进行专题研究的心得与体会，并补充某些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期对深入研究张之洞有所裨益。

目 录

导言 张之洞的道路	(1)
第一章 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1)
一 加入清流党及其地位和作用	(1)
二 向洋务派转化	(14)
(一)抚晋——转化的起步	(14)
(二)督粤——转化的完成	(20)
三 后起洋务首领	(27)
(一)气度恢弘的实业建设	(27)
(二)从自强军到湖北新军	(37)
(三)洋务活动的特点	(42)
第二章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对外态度	(47)
一 中法战争期间的御侮思想与实践	(47)
(一)力主抗战积极筹防	(47)
(二)对待和议的态度	(53)
二 督粤期间办理华侨及港澳事务	(56)
(一)保护海外华侨	(56)
(二)经办港澳事务	(59)
三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68)
(一)主抵抗、筹战守	(68)
(二)反对和议、主结强援	(73)

(三)反对割让台湾.....	(77)
第三章 维新运动中的趋新与恋旧.....	(82)
一 扶持维新运动.....	(82)
(一)“假维新”辨析.....	(82)
(二)维新派的同路人.....	(88)
(三)维新时期的人际关系与矛盾心态.....	(91)
二 与康梁维新派的分歧论争.....	(96)
(一)分歧论争的性质.....	(96)
(二)分歧论争的根源.....	(103)
三 《劝学篇》与“中体西用”论.....	(107)
(一)《劝学篇》——救时自保之药方.....	(107)
(二)“中体西用”的文化观.....	(117)
第四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内外斡旋	(126)
一 主剿义和团运动.....	(126)
(一)剿团和洋的建策.....	(126)
(二)镇压两湖人民反抗斗争.....	(134)
二 策划“东南互保”.....	(139)
(一)策划互保的动机与策略.....	(139)
(二)策划互保的表现与作用.....	(147)
三 辛丑议和前后言行评析.....	(154)
(一)参与议订《辛丑条约》.....	(154)
(二)声援交收东三省谈判.....	(161)
第五章 清末政治风云中的表现	(169)
一 以《江楚三折》为纲推行新政.....	(169)
(一)《江楚三折》的提出.....	(169)
(二)推行新政的思想与实践评析.....	(182)
二 对待预备立宪的态度.....	(186)

(一)宪政思想的萌发.....	(186)
(二)对立宪与官制改革的谨言慎行.....	(190)
三 不自觉的革命酿造师.....	(198)
第六章 推进晚清教育近代化 与幕府制改革	(206)
一 推进教育近代化的主要贡献.....	(206)
(一)创建书院与改造书院.....	(206)
(二)兴办各类近代学堂.....	(209)
(三)积极策动出国留学游历.....	(214)
(四)制订新教育制度.....	(219)
(五)倡议废除科举制.....	(224)
二 张之洞与晚清幕府制度.....	(226)
(一)张之洞的幕府.....	(226)
(二)张之洞对幕府制的改革——从幕宾到幕僚.....	(234)
(三)张之洞与幕府人物之关系及影响.....	(240)
附录一 建国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	(248)
附录二 建国以来张之洞研究报刊 论文索引(1949—1997)	(268)
后记	(285)

一 加入清流党及其地位和作用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晚清的“清流”，又称清流党或清流派，它是同治、光绪年间继洋务派兴起后，统治集团中的又一个政治派别。晚清的“清流”还有前清流和后清流之分，是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军机处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其幼子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訢于同年11月发动了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夺得了清朝统治的最高权力。为了应付风雨飘摇的局势，尚缺乏统治经验的叶赫那拉氏极

意依靠和笼络奕䜣，让奕䜣总揽朝廷内政外交大权。但是，当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后，权势欲极强的那拉氏便不能容忍声势显赫、大权在握的奕䜣了。为了垄断朝政，她突然下令罢黜奕䜣。由于群臣的反对，那拉氏后来虽然恢复了奕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却从各方面对他掣肘、裁抑。1865年底，她把同治帝的师傅、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处，对奕䜣进行牵制。李鸿藻思想保守陈旧，反对一切改革，在政见上与奕䜣等洋务派严重对立。他仗着慈禧的支持，利用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结纳在自己的周围。时人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选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① 清流派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一般都大胆敢言。他们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奕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全国”，^② 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为了扼制奕䜣和李鸿章等人势力的发展，需要在统治集团内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于是，她施展种种政治手腕，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权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捞取“清议”的拥戴和舆论的支持。自己则居高临下，随意操纵各派政治势力，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张之洞之所以参加清流派，是由其教养和经历所决定的。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熏染。从小对功名怀有很强烈的追求。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13岁就成为秀才，16岁中头名举人，26岁中探花。此后，张之洞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过了近二十年的翰苑言官及学官的生活。这段经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朝廷中那些“清流雅望”又没

①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

② 《清代轶闻·清流党之外交观》

有掌握实权的清流人物接触，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日益和清流派接近。1877年他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再度充任教习庶吉士这个冷差。此时，适逢他的40岁生日，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之洞，面对的现状却是国势日衰，个人官运蹇滞，加上自己手头拮据，两袖清风，连做生日都是典当了妻子王氏的陪嫁首饰才置酒自祝。公私交迫，景况不佳，凡此种种，张之洞莫不感慨系之，心怀抑郁。恰在这时，京师清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引人注目。张之洞对他们的主张深感同调，于是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考据之学”，^①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十数人“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朝政，一时殿陛风生”。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加以他才华横溢，思虑周密，所上奏折都很有份量，不能不令人叹服。所以，张之洞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清流派的一员健将。他和张佩纶被时人称为“青牛角”（清流谐音）“尤为李鸿藻所器重”。于是，“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思，广结党援。”^②张之洞以清高自诩，以匡济自负，和清流派人物一起活跃于朝野上下，他们“连成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③成为朝廷中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张之洞的清议活动，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不仅对清廷的内政外交问题直抒己见，而且还提出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举其荦荦大端，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

① 胡钩：《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下同）卷1。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第32页。

③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第90页。